

夷越

中日夷越文化探究

中日の夷越文化の探究

应骥〇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中日の夷越文化の探究

中日夷越文化探究

应骥〇著

夷越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夷越文化探究/应骥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 - 7 - 81112 - 610 - 5

I. 中… II. 应… III. ①夷—民族历史—研究②越—民
族历史—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854 号

夷
越
中日夷越文化探究

应骥
著

策划编辑: 柴伟

责任编辑: 李兴和

装帧设计: 刘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耀骏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313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610 - 5

定 价: 30.00 元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弁 言

早在十多年前，当笔者还正在为《巴人源流及其文化》一书进行增删修改和定稿的时候，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写出有关东夷人、越人长时间、远距离的大规模民族迁徙和夷越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书。这一动机的产生，是由于被人们谈论得沸沸扬扬的日本民族祖先源于云南之说（正确的说法应是源自古代生活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少数民族，即东夷人和越人）并非空穴来风、胡编乱造的无稽之谈，而是实事求是、有实物或民俗方面的种种表现可资佐证的事实。只可惜过去几乎无人关心、过问，更缺乏这方面的调查了解，因此没法进行比较，作出科学分析和合情合理的推论，以致长期以来它始终是我国在此领域内的一项空白。

笔者作为曾在高校任过日语教学工作和多年来从事有关语言、民族、民俗等相邻学科的比较与研究的老教师，深知此项研究若能取得关键性的突破，不仅可以解决科研上的重大疑难，为我们国家、民族争光，而且也是为大力推动中日友好，构筑起一个全新的和谐世界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笔者怀着为早日改

变目前这种滞后状态而竭尽全力的强烈愿望，在经过查找国内外文献资料并与已掌握的一些信息进行了反复比较和周密的分析、思考后，终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写出了诸如《红盖头与花甲葬》、《土家人与倭人》、《从火崇拜民俗看夷越文化传播》等有一定分量的论文，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

历经数年不间断地笔耕，到如今总算工夫不负有心人，《中日夷越文化探究》已完稿，并出版成书。笔者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想起当时的最后冲刺，压力似乎愈益强大。不过信心还是足的，毅力也是有的，相信继续“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努力，终会到达理想的彼岸。

其实，探究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与一衣带水邻邦的日本民族之间是否存在民族渊源关系这一陈年老账，在近二十年的时光中，笔者一直在时断时续地对彝、白、土家、壮、黎等民族与日本人在其各自的生活习俗、年节礼仪、信仰、行业文化乃至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发现其间确实存在着过去鲜为人知的相似、相同的习俗做法。尤其是土家族，连他们自己也讲不清楚的奇风异俗，竟然能在日本人的相关习俗中找到答案或者是从中得到启发，进而悟出道理，作出合理的诠释。如像土家族过“赶年”，与日本人过“大年”（日语叫“私大”，实际上是指没有年三十的年份，要推迟一天过年，使之有“除夕”，以便进行追傩求吉的做法。）有相似的地方。又如土家族人在过年之前，要手持钢刀在自家门前“站岗”，伺机逮陌生过路人强行将对方拉回自己家以酒肉款待，吃完后又分文不取听其自由离去；要是

抓不到人，那就得蹲着往前看上三眼。说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年平安。可是这种古怪习俗，居然与日本人除夕时的“夜雉追神事”对上了“号”，发现其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些情况已在《巴人源流及其文化》中作过介绍）

再从吃的方面来看，我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居民，过年要吃糍粑，正月十五要吃汤圆（或称“汤团、圆子、元宵”）等年节习俗，日本人也同样有。端午节吃粽子习俗日本人也有。他们的粽子（日语也写作“粽”，读“ちまき”，这个词来自“茅卷き”），据说起先是用茅草叶卷着糯米或粳米做粽子，后来改用蔺草叶包。据辞书记载，日本粽子多呈长圆锥形或三角形，不过据来重庆大学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介绍说，他们的粽子是用一种大树叶包的。他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剥去了外皮的粽子，样子有些像重庆街头叫卖的“粑”。笔者估计土家族的“刀把粽”就跟这种粽子有些相像。所谓“刀把”，是指老式菜刀的刀把，它与重庆所辖周围区县的麦粑、荞粑、糯米粑、叶儿粑、猪儿粑……同类，应该是夷越饮食文化的遗存。

除此之外，我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祭果树（即向果树施以巫术，促使其多结好果）的做法，也是夷越之民的遗风。土家族、白族有，日本人当然也有，而且做法十分相似甚至连人们施巫术时所说话语的内容，也相像得令人感到惊讶。（具体做法请参阅“文字语言”部分）

习俗流传既可以是同族人内部的代代传承，也可以是同居一地的非同族人之间的模仿（这种流传有时是全盘模仿并接受，最

后成了自己的习俗；有时是局部模仿、接受或使之融化于自身原有的类似习俗中去），这是尽人皆知之事，无须多提。然而像上述几个民族那样，分别处在数百里乃至上万里之遥的远方，甚至被大海阻隔的异国他乡，其习俗做法竟能如此相像，甚至连要说的话的内容含义也基本上相同。这除了能证实他们的先民曾是同源民族外，还能找到比这个更具说服力的缘由吗？更何况类似这样的习俗还有很多。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把这些过去无人过问的民俗细节加以整理、比较，找出原因、理由作出合理推断，并用这些说服力很强的证据一一披露，公之于众，从而证实古代东夷人、越人确实有过民族大迁徙。他们不仅有自东往西，继而又从北向南的远距离、长时间大移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则自西往东跨海去了日、韩、朝等国。

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到了黄河上游的氐羌系民族先民中，还有不少人竟然沿着河西走廊取道昆仑山脚下的狭长通路，往帕米尔高原挺进，翻过世界屋脊到了印巴交界地段，然后又转身改道去了印度的东南部，最后落脚到泰米尔地区。这也是过去无人知晓的“秘密”，这是笔者从《穿越帕米尔高原》（译著）和《日本人の出現》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作出推断的。据《日本人の出現》（第224～226页）称：在1995年10月29日由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日本民族的形成作为题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大野晋先生谈起了泰米尔语和日语之间相对应的讲话时说，日语与达拉毗茶语系中的泰米尔语约有500个单词在

音、义上相近似，而且泰米尔语与日语、土耳其语等阿尔泰语族语言一样，也是黏着语，在语法方面也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根据以上所述，笔者率先提出日语与达拉毗荼语系语言以及藏缅语族中的彝语支语言之间，尤其是语法方面的相似点远远超出了藏缅语言与汉语之间的相似点，因此应实事求是地依照同源民族间的相似语言的具体情况作为鉴别语言的重要条件之一来进行考虑，重新确定日语、朝、韩语等语系的归属问题。

看来夷越先民自古就是敢想、敢闯，勇于进取的优秀民族。越人先民能驾舟远渡重洋，往南，到了大洋洲的大小诸岛屿；往东，直抵美洲大陆，成了印第安人的远祖；往西，则去了非洲大陆，至今非洲民族仍盛行儋耳^①古风，祖鲁人的住房“克拉尔”（kraal）很可能就是越人干栏的音译。

上面所说的无非是想表明撰写本书的目的（或曰宗旨），也就是在书中屡次提及的古代东夷人、越人的民族大迁徙，并以东、西部民间相似的习俗为依据，再次有力地证实古代移民之存

① 儋耳：儋原作“瞻”，瞻耳即“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至肩”。“瞻，垂耳也。从瞻声。南方有瞻耳之国。”以上是《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上所记述。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蛮列传》称：“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这是说彝族先民哀牢人也有此习俗。儋耳的做法是用刀划破脸皮一直划到耳朵根，让一条条被划破的脸皮牵扯着耳朵一齐往下垂，而且要“累耳下垂至肩”才美，这是古人的美容术和审美观。后来改为穿耳孔，往耳孔里塞圆状物件使之不断扩大下垂，久而久之也就“垂耳三寸”了。海南省古代有儋耳人，即黎族先民。据日本《风俗辞典》称，绳文人的耳饰有白形耳饰、玦状耳饰和棒状耳饰，这些都是用以塞耳孔，以扩大耳垂孔使之下垂的物件。上述情况足以证实儋耳也是夷越古风之流传。另据《裨海纪游》、《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介绍，高山族也有此习俗做法。儋又被写成“𪛗、𪛘、𪛙、𪛚、𪛛、𪛜”等，被称做“巴𪛙、巫𪛙”的麋君蛮巴人，当然也是有此习俗的东夷后裔。

在是毋庸置疑的史实，它也正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不过这是前无古人的新说，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甚至是谬误，相信读者诸君定能体察及此，甚或直率提出问题症结所在，并惠赐宝贵的意见或建议。

目 录

弁 言

第一章 夷越民族迁徙及其文化传播/1

一、夷越民族/2

二、东 夷/4

三、东夷迁徙及其文化传播/7

四、山西南部民风民俗所折射的东夷西迁踪迹/14

第二章 夷越人和日本民族的生产与信仰/27

一、人类自身的生产——成人和婚恋/28

二、原始宗教与生产/68

三、原始宗教中的夷越文化色彩/85

第三章 中日两国民间的岁时年节/101

一、年末岁首/102

二、上巳、重三与“雉”、“雉祭”/158

三、端 午/172

四、七夕、中元、盂兰盆/190

第四章 中日两国的蚕桑文化与茶文化/221

一、蚕桑文化/222

二、茶文化/243

第五章 中日夷越之民的文字语言、神话、傩文化/277

一、文字语言/278

二、竹生人神话/322

三、傩、傩戏与“能乐”/332

参考文献/352

后 记/355

第一章

夷越民族迁徙及其文化传播



东夷
中日
夷越
文化
探究

一、夷越民族

所谓夷越，就是指古代生活在我国东部、东南部至华南沿海的东夷人和越人。东夷主要在山东、苏北的黄淮中下游地区，往北，也有不少环渤海而居的族群；越人则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广袤土地上，尤其集中在东南至华南近海一带。

住在偏北地段的东夷人，多为北亚人种（即北方亚细亚蒙古利亚人种），住在偏南地段的东夷人，多属南亚人种（即南方亚细亚蒙古利亚人种）。越人几乎全是南亚人种。

从人类体质上看，北亚人种头骨轮廓较圆，颅顶突起不明显，高眼眶，两眼间距较宽，眼窝较浅，鼻腔部位偏下，颧骨不外突；南亚人种头骨轮廓分明，颅顶突起显著，低眼眶，两眼间距较窄，眼窝深，鼻腔部位稍偏上，颧骨向前突出。从整个脸盘看，北亚人种大致面部起伏较平缓，立体感不强，颧骨高，眼球外鼓，多单眼睑，鼻根较高，口吻不外突，嘴唇较厚，胡须、眉毛、体毛稀少，多秃顶；南亚人种面部立体感强，眼睛大，眼球凹陷在眼窝内形成“深目”，双眼睑较多见，鼻根低，口吻前突，嘴唇薄，胡须、眉毛、体毛较密，秃顶较少。与北亚人种相貌相仿，人们熟知的有著名笑星陈佩斯，著名影星张国立等先生；或者说较典型的是蒙古族。与南亚人种相貌接近的则有著名笑星李金斗，著名影星李幼斌、汤显宗等先生；或者说较典型的是福建人、广东人或壮族、黎族等。此外，北亚人种一般肤色浅，身躯高大魁梧；南亚人种肤色较深，除濮系民族（即东夷人中的徐夷、淮夷）外，其余大都瘦弱矮小而单薄，但较灵活。古时多施以文身（即在皮肤上刺青），凿齿（拔去门齿或第二、三门齿，犬齿）等古代美容术。

上面所说的只是通常情况下的外观形象。但由于人体组织构造极为复杂，经常会产生基因突变，加上不同民族、人种之间的

通婚，民族融合，混血人种的不断涌现等诸多因素，致使客观现实往往与上述“对不上号”，这种现象理应排除在外。

东夷中的南亚人种（即濮系民族）一般身材高大，多有头颅“人工变形”的习俗（指颅顶凹陷等现象）。鉴别这些特征，实际上是考古工作中确定墓主是不是濮系民族的简易有效的辅助性手段，以往人们大都醉心于出土文物，对人骨则少有过问甚至并不了解，以致失去对墓主民族鉴别的良机，殊为可惜。

关于所谓的头颅“人工变形”，有些人以为这纯属人为地改造头颅形状。笔者则认为它实际上是由于东夷人生活习俗所造成的结果，并非为了追求某种效果而故意紧压头颅使然。也就是说，他们在搬运较大物件时惯于用头顶运载重物，久而久之造成了颅顶下陷形成凹穴。如《中国悬棺葬》第96页指出：

“1979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清理的一具棺编号为荆竹坝18号棺，内有人头骨2个，经鉴定一为10岁左右男孩，一为13岁女孩，两个头骨均有顶骨冠状凹陷，似生前有用头顶负重的习惯……”

又如同书第219页称：

“楚人的体质除凿齿以外，还有头颅改形的习俗，悬棺中人骨架的头顶骨均有冠状方向的浅横凹，凹陷位于顶结之前，冠状缝之后……左右两面侧凹陷一般没有明显差别，似为某种形式的负重所造成。四川长江三峡地区巫溪县大宁河流域荆竹坝M18号悬棺内2具西汉颅骨顶部的冠状凹陷情况，与川南珙县楚人颅骨上的相同，说明生前也有头颅改形的风俗习惯。两地悬棺葬之民虽时隔1000多年，相距上千公里，但从都有头颅改形风俗习惯来看，便更加证实了川南楚人悬棺与川东长江三峡地区的悬棺葬在族属上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

同为东夷后裔的韩国（或朝鲜）女性也同样有头顶重物进行

搬运的习惯，她们头顶能承受重负，只消一只手扶着重物甚至一只手也不需要扶，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最令人佩服的是头顶放一直径1米多的装满水的圆形大木盆，里面全是活蹦乱跳的活鱼，韩国妇女们就能“双手撒把”自由自在地走在大街上，边走边吆喝叫卖，两眼还能左顾右盼、可是头顶木盆里的水却“滴水不漏”，其技艺之高超不亚于专业的杂技演员。男人则很少这样做，他们的头多用于打架，勇猛堪比黄牛。这一招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被冲翻在地。不过若遇到拳脚好的中国人，那情况就不同了，因为中国拳师惯于用腿，只消对准（躬着腰猛冲过来的）对方小肚子一脚踢去，来犯者不是被踢昏倒地就是双手捂紧被踢伤的部位嗷嗷乱叫。这些都是笔者自幼在韩国亲眼目睹的事实。

《日本を知る事典》第242页上的插图，是一幅头顶着扁担挑粪桶的老照片，是伊豆诸岛中的神津岛农村所摄。神津岛附近的新岛、式根岛等也有这种极为罕见的搬运方式。据该书称，日本古代盛行头顶着大件重物进行运载，如像搬运劈柴、行李、器具，或挑水、担粪乃至携带商品沿街兜售，莫不惯用头顶重荷进行运载习且以为常。为使头部缓冲，稳固运载起见，还用竹皮、稻草、秸秆或布、毛巾等卷成圆环垫在头顶。这种做法曾流行于东北亚各国，它无疑系古时濮系民族风习之传承。

二、东 夷

所谓蛮夷戎狄本是我国古时自诩文明进步的华夏之民对其周边尚未开化民族的蔑称。对居住在东部的，称做东夷，西部的为西戎，南方的为南蛮，北方的为北狄。至于所指的是哪些民族，范围多大，人口若干等具体情况却一直无定论。故九夷之说亦有多种，诸如九夷为玄菟、乐浪、高骊、满饰、鳧夷、索家、东屠、倭人、天鄙，或说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

夷、玄夷、风夷、阳夷。另外山东半岛东北部有莱夷、嵎夷，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有岛夷，淮河中下游有淮夷、徐夷。再从上面所举的乐浪、高骊，其地应在朝鲜半岛北部至我国东北，倭人即日本大和民族前身，皐夷后世称“扶余”。至于满饰是否指满族，尚不敢肯定。这样一来，东夷地域包括了从东北经华东至东南部广大国土乃至东北亚的日、韩、朝等国，所指的民族亦绝非单一或几个，这些错综复杂说不清道不明的含糊提法，确实难以稽考。因此本书只能按照所探讨的内容，根据已掌握或基本明确的情况，对所涉及的民族作必要的鉴别。即便如此，仍然还有许多无法区别的情形，尤其是东夷中的濮系民族与南方的越系民族很可能是同族异支，故其习俗文化乃至语言都有相似、相同的地方，经长时间远距离的传播，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鉴于此，笔者不得不以“夷越”联称来表示。

关于东夷中比较重要而且大致已明确的，除徐夷外就要数吠夷（又称“犬夷、昆夷、缁夷”），西迁后改夷称“戎”。《巴渝文化》第三辑第101页刊有《巴蜀古王考》一文，明确指出吠夷西迁这一史实：

“如先秦时代的犬戎族，原居山东，地名曰犬丘。

后该族自山东经河南迁至甘肃天水，犬丘一名也随之留在河南，搬至天水。”

《辞海》记载：犬丘一在陕西兴平东南，一在河南永城西北。

到了黄河上游，犬戎（昆戎）辗转南下抵达川滇，此时犬戎中的部分支系被称做“昆明夷”（或“昆明蛮”）。“吠、犬、昆、缁”系同音异写，“犬、吠”读“kuan”。《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第246页的《怒江中游考古综说》一文称：

“分布于龙陵县怒江流域、昌宁、保山澜沧江西岸福贡县各地的忙怀型文化，其族源在云南曾有三说。一说出自氐羌系的‘昆明蛮’，认为‘澜沧江河谷地是昆明蛮的发源地，澜沧江及其支流河谷的新石器文化是昆

东夷
中日夷
越文化
探究

明蛮创造的’。”

《史记·西南夷列传》也提到过昆明，如（西南夷君长）“……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原来昆明夷是游牧民族，跟氐羌系其他民族一样，也是北亚人种。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145页记载：

“鬼方 中国北方与西北古代民族名，‘鬼’字有……‘媿’、‘隗’……‘潰’等异写；而鬼方也往往与昆戎、昆夷、缁夷、串夷、畎戎、畎夷、狄、洛泉、徐蒲等相混称。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南部，而势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支流汧、泾、洛水一带。……后世有鬼方为玁狁、匈奴、西戎、羌人、先零羌、南蛮、荆楚等族的异说。”

犬戎又称“玁狁”，鬼方也称“玁狁”，“玁、玁”都读“xian”，而“狁”的江浙方言读音与“戎”相近，因此这些大致都是同音异写。近代一些考据家认为：鬼方、昆夷、玁狁为同一民族的不同名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对西迁东夷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氐羌系先民尚未西迁时的族名之一，可能是（东夷中的）畎夷，即犬夷、昆夷、缁夷。西迁后改夷为戎。西迁开始曾称“鬼方”，亦称“玁狁（玁狁）”；抵达黄河上游后，犬夷成了犬戎，后来又逐渐被称做“羌”。羌，实系“畎、昆、鬼”三字读音上的转变，其基本读音为“kuan”。

（2）这里的“西迁”，无时间和民族的限制、区别，且来去自由，去留随意，加上商贸旅行，因事、因故乃至择地迁居甚或躲避兵燹、灾害……人员往返频繁，造成史书上频频出现同一民族称夷或称戎，或一族多名等情况，使民族鉴别出现诸说并存乃至误差。